

结论

七十年代日本的政治

——新的展望——

安保体制派对外强调同美国合作，对内完全否定和平宪法，依靠实力推行政治活动，继续在七十年代推行彻底的保守独裁政治。针对这种情况，拥护和平宪法派在谋求自身革新的同时，不是必须确立以“非暴力”的直接民主主义进行抵抗吗？只有在这种努力之中，第一次革新政权才有可能出现吧！

强化日美命运共同体

通过上述几节，具体的详细的观察了安保体制派无视议会制民主主义，同政、财、官界勾结的实态的各个方面。安保体制派自一九六〇年的日美安保条约修定以来，经过十年的时间，为七十年代保守独裁政治打下了基础，这种尝试大概成功了。七十年代的安保体制派终于正式的以保守独裁政治为强大力量开动起来了。应该说一部分已经动起来了。那么依据安保体制派的意图七十年代日本的政治，具体的如何展开，应如何看待呢？

首先看外交方面。根据一九六九年佐藤·尼克松会谈所发表的日美共同声明，一九七二年归还冲绳。佐藤内阁宣传：“不经战争返还领土是罕见的事情”，因此一九六九年末的大选中获得了胜利。只是由佐藤内阁来归还冲绳，高兴得太天真了吧！究竟促使美国归还冲绳的最大理由是美国保

护美元政策和战略体制的变化，由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会计年度预算咨文看出美国的国防费用支出是七百九十七点九亿美元（比前一年度增加三十三亿美元），这里越南战费是二百五十七点八亿美元，此外，美国为了维持“自由世界警察官”的地位（？）向西欧、东南亚派遣军队，支出巨额经费。而且，多数在外国军事基地驻扎的美军同该地居民有形无形的摩擦也看出，美国在外国军事基地的国家本来是不是为了美国的利益颇值得怀疑。美元外流国库空虚，对巨大的海外国防费的支出在国内的批判也日益高涨。从ICBM（洲际弹道导弹）B₅₂战略轰炸机，装有核武器的北极星式潜水艇的开发，从战略的观点来看，美国在海外的基地的存在也是个问题而被提出来的，美国政府也从一九六九年的时候开始着手缩小海外的美军基地。归还冲绳也是由于美国国防政策的转化而出现的动向。

尽管如此佐藤内阁却宣传说：“归还冲绳是日美合作的表现”，促使韩国和台湾的联合而开始代替美国的海外援助，强化日美经济合作，通过一九七〇年日美安保条约的自动延长，成了与美国命运的共同体。特别是一九七二年冲绳在事实土跟随核武器返还的，结果带来了日本本土冲绳化即核基地化，使中苏两国对日本更增长了警戒心，这个现实是不能忽视的。

一九七〇年一月三日的《每日新闻》综合了神谷不二（大阪市立大学教授）、永井阳之助（东京工业大学教授）、冈部达味（东京都立大学教授）、坂本义和（东京大学教授）等各位专家的意见说：“亚洲的主角从美国转到了日中两国”。同样，同年一月一日的《朝日新闻》采访政界、财界、官界、国民运动家、工会领导人一百人的时候，

其中有六十九人估计一九七〇年美中关系将要正常化。美中有一天突然携起手来，可以想像得到只有日本成为亚洲的孤儿这种事态将要发生。

《每日新闻》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调查的时候，日本国民的百分之四十一，以某些理由表明希望日本中立，对佐藤内阁的对美从属姿势抱有怀疑。尽管如此，佐藤内阁以及继其位的保守党内阁，都不希望对美从属外交的彻底转变，更不希望实现。原因是，保守党内阁背后的财界，考虑到长远的利益，他们害怕当前因纠正对美从属关系而派生出来的日美经济关系摩擦的激化，由于台湾对日断交而冻结在台湾的日本资产等。

提高国防思想的目的

安保体制派在国内方面，首先以发扬民族主义为杠杆对国民“自上而下”的强制国民同意，迫使国民发扬国防思想。保守党内阁把对美从属所带来的国民的从属感、劣等感、疏远感巧妙地以民族主义加以替代，以求国防力量的增强，六十年代由于需求的增加带来了经济繁荣，汽车、钢铁、电机等第二次产业生产率的提高。这些产业的增长，逐渐的缓慢下来了。八幡、富士两制铁公司的合并，使走在夕阳路上的钢铁垄断资本能够重新整顿克服困难。在这里财界确实也花钱了，着眼于规模大的国防产业的振兴。发扬国防思想不仅对保守专政、强化安保体制有用，而且有利于国防产业的振兴，有一箭三雕的价值。

第二是坚决实行体制民主主义的实力政治。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的总选举中，自民党获得了二百八十八个议席的“大胜利”。可是，保守党的得票率从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六十点一的最高峰继续下降，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也只得了百

分之四十七点六，较上次大选（一九六七年一月）的百分之四十八点八减少了。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选举中自民党的大胜利，大概是蒙受在野党候选人互相顶撞和断崖中选举区的选举制度的有利条件（B）。与自民党表面上的安定相反，出现了得票率的减少、党内派系间抗争的激化、农民协会组织的造反等不安定因素。

为了防止这些不安定因素的扩大，自民党政府要坚决实行依靠强迫体制民主主义和有力的政治。所谓体制的民主主义，是掌权者即安保体制派把“或是民主主义”或是判断的事实体制强加给国民，强迫其遵重和忠实的履行，在这里安保体制派最强调的是民主的秩序。安保体制派以民主主义等于民主的秩序进行偷换概念，甚至以维持秩序为名干涉民主的国民运动、工人运动。彼时，国民若表示抵抗的姿态，就立即指挥警察、自卫队等国家暴力机器加以镇压。这是依靠实力坚决实行的政治。

在国会会场上自民党的强行表决也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这里也是自民党同民主主义等于议会主义，也等于多数决定相结合，最终一定以力量战胜在野党。本来，议会是以公开和自由讨论为生命的。各党由于审议的公开和讨论明确本党的是非曲直，要求国民的支持应该遵敬批判。可是，像现在这样自民党的强行表决和一部分执政党在野党干部的背后交易如果经常化，连对议会本身也会出现否定的情绪。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的投票率是百分之六十八点五一，是战后第二次低率投票。电视竞选尽管在众院选举中采用了，但投票率仍然下降了，在弃权者中不承认议会本身的存在的心情不是很好证实吗？可是，现在自民党取得巨额政治资金、选举资金（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的选举中据说财界向自

民党提供多达一百亿日元的资金)同财界签订的公约在梦中都想实现,他们连忧虑议会政治危机的余暇都没有。

经济虽然成长但不能乐观

国民生活怎么样呢?日本经济中虽然一部分产业有波动,但每年以百分之十四点五的增长率增长,到一九七五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说不定要达到四千亿美元,到一九八〇年说不定增一倍能达到八千亿美元。因此保守党政府把这种估计同未来学的福利国家理想巧妙地结合起来,鼓动在保守党政府之下用安保来制造繁荣气氛这是肯定无疑的。

只是,现实的国民生活受到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所带来的高物价的影响,缺乏繁荣感的苦闷是可以想像的。原因是,在保守党政府之下,由大企业管理价格,只要能维持,国民很少能得到由于大规模生产降低成本的实惠,把大企业提高工资→大企业生产量增长→中小企业提高工资→中小企业生产量增长→一般物价上涨→大企业提高工资的恶性循环,作为扩大再生产的因素。

尤其是高速度成长助长通货膨胀、地价暴涨,因此造成住宅困难,公害横行,带来了为提高生产率而搞强制合理化和劳动强化等,使国民增加了生活上的不安和焦躁。

一九六〇年,自称“日本经济请交给我吧!”的池田内阁上台了,提出了月薪增长二倍的论调。诚然,月薪增长二倍论在名义上达到了,可是物价的增长超过了月薪的提高,带来了所谓宏观(国家、企业)的繁荣、和微观(国民)的贫困这种奇妙现象。关于未来七十年代的日本经济不要说日本的现代经济学者,就是美国的一些学者也表示了乐观的估计,他们当中有哈曼·卡恩(哈德逊研究所所长)、摩利(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阿别古莱(波士顿·咨

海集团副总经理)等各氏。可是,日本国民对日本经济成长在六十年代的十年中,只看到了一场虚幻的梦境,对七十年代的景气的佳话仍然令人难以置信。特别是在七十年代里,美国经济景气估计要衰退的情况下,同美国是命运共同体的日本受其影响也是十分可能的。

总而言之,保守党政府即安保体制派,在七十年代散布经济成长幻想的本质就是要试图对外追随美国,对内推行权力政治,增长国防力量,企图使战后培育起来的和平宪法体制空洞化,然后加以破坏,这是可以肯定的。

进行革新的革新

和平宪法体制的空洞化即遭到破坏,仍然是关系到对战后民主主义的否定,和平宪法拥护派即反体制派方面必须阻止安保体制派方面的任何尝试,可是,现在的和平宪法拥护派没有能够阻止安保派意图的实力。政界的革新势力,特别是社会党,在考虑同自民党的交易,丧失了“革新的灵魂”。而且若说选举也公认必须是工会出身者为候选人,选举资金也靠总评议会。选举口号是照抄宪法条文。革新主角的社会党的主体性不是从哪也看不到了吗?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的选举中,弃权率高和社会党的惨败,连拥护和平宪法派的市民都表示厌烦社会党。社会党特别是在今天,应该在恢复社会主义政党的清洁感、使命感主体性的同时,应坚决实行党内民主化。与此同时,要纠正对工会,特别是总评的企业的信赖,纠正首领统治,必须彻底贯彻工会内的民主主义。

其次必须集结在野党、革新团体等拥护和平宪法势力,对国会加强监视,促进反战、和平和日中友好。现在的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共产党等各政党,都因积极扩大自己的势力而互相伤害,使当前的共同敌人自民党高兴了。不,

严重的是一成了政党，一边在口头上高唱拥护和平宪法，一边又同安保体制派合谋。对于拥护和平宪法派来说重要的是舍小异求大同，是无论如何也要阻止安保体制派的危险尝试。这意味着在议会内强调在野党共同奋斗的同时，在院外，例如：为恢复日中邦交共同奋斗也是有效的。日中恢复邦交，就能起到纠正过分依靠美国的安保派姿势的作用，对保持日本的和平和安全也会做出巨大贡献。

弃权危险吗？

自诩为拥护和平宪法派的国民的责任也是繁重的。

口喊拥护和平宪法的人满不在乎的高唱旧军歌，认为自卫队的存在是不得已的。在现实中自卫队的壮大，也在群众中扎根了。越是壮大，那么，自卫队的违宪性就越是增加了，越是看到自卫队在国民中扎根，越能看到拥护和平宪法派的基础正在被动摇，这点必须看清楚。

拥护和平宪法派的国民，尤其在今天，贯彻宪法的民主主义，三权分立的理念，应该打破安保派的政、财、官界的勾结。为此，间接民主主义也就是说选举权应为要害问题。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的选举中，自民党的得票率只不过占投票者（百分之六十八点五一）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六。假设以一亿日本人口计算，积极支持自民党的人不过三千二百五十万。不过，因此就说：“不承认自民党政权”“投票有多么无聊”，把这看成是无用的也是不对的。在现实生活中是自民党行使着权力，他们要掌握表明不支持自民党的六千七百五十万人的生命、安全、财产、以及生活。拥护和平宪法派以“投票多么无聊”为理由而弃权的话，高兴的正是拥护和平宪法派的敌人即安保派、自民党。

反之，拥护和平宪法派积极地投票，在野党的得票率若

是高的话，安保派不得不相对的后退。安保派的后退必然引起与自民党相勾结的官僚、财界的不安，这就会给安保派整体带来破绽的可能性。如果说出现了“明天的自民党政府还不知道怎么样呢！”的事态，具有强烈出人头地欲望的高级官僚恐怕也不能只为自民党服务吧！极端的说，就连警视厅机动队的游行示威规则也不得不放宽了吧！明天的自民党政府如果危险的话，每中机动队员也不能“安心”向学生挥舞棍棒了。

追求直接民主主义的可能性

当然只行使选举权就想顺利的确立民主主义那就大错特错了。选举权即间接民主主义，永远不过是表明民意的一种手段。自民党往往把民主主义放到议会主义的框子里，通过选举若是获得了相对多数，宣传在民主主义的名义下，不是什么都可以进行吗？可是连公开性和自由讨论的议会的本来使命也要一笔抹煞。

对于这样的自民党，应该行使表明本来民意形态的直接民主主义。特别是在院内在野党软弱，执政党自民党专横拔扈经常化的今天，也应该说是院外在野党的国民一个人一个人的行使直接民主主义，以此来阻止自民党的专横，独断是必要的。面向国会的大众请愿行动等的意义也在于此。

面对国民的自治体首长和企业的直接民主主义行动也有意义。只是彼时的行动要以“非暴力”为基准，如用“暴力”对付安保体制派，也否定了直接民主主义的本身，很可能给安保派提供很好的借口。

户畑区妇女会联络协议会，把北九州夸耀的八幡制铁，提到“世界”的八幡制铁来看是最冒烟的工厂。上述妇女协议会称之为“世界的八幡”于一九六一年，向污染了大气的

八幡制铁提出了“还我青空！”的抗议，虽然当初也有对“天下的八幡制铁的反抗”持踌躇态度的人，但妇女协议会的领导人以地区住民的团结为背景，向市当局、八幡制铁当局就防止大气污染问题进行了多次交涉。戴着盔形帽到工厂参观，得到大学协助进行的公害调查、向一个人一个人的市议员公开征求意见等，在进行这些工作中，包括户畑区一带的妇女会（六百五十人）的市民运动发展起来了。为此八幡制铁也不得不把约一百亿日元投入防止公害对策中去，北九州市议会也设立了矿山公害对策特别委员会，开始研究具体对策。户畑妇女协议会的运动虽然还不能说是取得了十分的成果，但是地道的妇女的直接民主主义运动，总而言之，触动了焉然不可侵犯的八幡制铁是不可否定的事实。

这种保卫地方居民的和平、生命、生活、财产的直接民主主义，实现了地方自治体的民主化，所谓对“与中央直接相连”的中央官僚统治的行政打进了楔子。像这样的直接民主主义运动广泛展开，就能动摇中央权力即由安保体制派形成的政、财、官界结合体制吧。由于打破了安保派的勾结，和平宪法一定会恢复本来的民主主义机能，安保体制派的基础将大大动摇。只有到那时，拥护和平宪法派政权的展望不是才有可能吗？